

文史选编

江西省人民政府参事室
江西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 编

文 史 选 编

(内部参考)

江西省人民政府参事室 编
江西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

1987年12月

文史资料选编目录

一、忆“三·一八”惨案——纪念刘和珍

烈士殉难六十周年……………周兰清（1）

二、北伐军进攻南昌见闻……………蔡奠华（5）

三、大革命时期我在南昌参加革命活动的

片断回忆……………徐先兆（9）

四、欧阳祖经与江西图书馆……………王咨臣（14）

五、黄道同志下山前后……………徐先兆（20）

六、随枣战役的回忆……………张玉龙（26）

七、扼守盘和镇和潼关的回忆……………乐典（29）

八、追忆血战高安……………毛羽芳（38）

九、鄂湘赣边区抗战片断回忆……………廖宇阳（40）

十、姚显微教授抗日殉难始末……………王咨臣（46）

十一、缅怀以身殉国的谢介卿团长…毛羽芳（57）

十二、战时江西的驿运……………周希敦（59）

十三、抗战时期江西省政府见闻……………王邦范（65）

十四、抗战时期新建县人民的对敌斗争

- 争.....王咨臣(71)
- 十五、南昌沦陷亲历记.....李珍一(81)
- 十六、胜利的狂欢.....周效之(84)
- 十七、抗战胜利归来的南昌见闻.....陈贻琛(87)
- 十八、我所知道的忠义救国军.....陈杰生(93)
- 十九、文山报与杨不平.....龚 屏(103)
- 二〇、沈醉和我.....赵秉钰(109)
- 二一、漫谈滕王阁.....王咨臣(118)

忆“三·一八”惨案

——纪念刘和珍烈士殉难六十周年

周 兰 清

今年三月十八日是刘和珍烈士殉难六十周年。我与刘和珍烈士没有直接交往，但多次听到何玉翠老师（九江孺励中学毕业，与刘和珍同学，后在葆灵女校任教）谈到她的情况，所以对她的印象很深。刘和珍是江西南昌人，生于一九零四年。她是南昌女子师范学校的优秀学生，在南昌创办了进步组织“觉悟社”，出版了革命刊物《时代之花》，因而被誉为“五四”运动时期江西妇女运动的火车头。她在一九二三年秋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后，很快被选为学生自治会主席。成为当时北京学生运动的领袖人物。在驱逐北洋军阀走狗女师大校长杨荫榆的学潮和对反动政府的斗争中，她总是站在斗争前列，深得社会进步人士的赞许。

1926年3月18日，段祺瑞政府血腥屠杀爱国学生，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刘和珍、魏士毅、杨德群等烈士，为了祖国，为了人民而壮烈牺牲，距今虽已逾六十周年，但烈士的音容笑貌，以及悲壮的一幕幕，犹历历如在眼前。

自从腐败无能的清政府与帝国主义列强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之后，伟大的中国就成了砧上之肉，任人宰割。受帝国主义支持的反动军阀，对外卖国求荣，对内互相混战，对人民的反帝爱国行动，则实行残酷镇压。

1926年初国共合作后，我国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已进入敌我决战的前夕。受日本帝国主义支持的奉系军阀进兵关内，冯玉

祥将军率领国民革命军封锁大沽口，日本帝国籍口援助奉军，以军舰两艘开进大沽口，炮击国民军，国民军开炮还击。日本帝国主义就威胁北洋军阀政府，一方面向段祺瑞执政府提出所谓“惩凶”、“赔款”等无理要求，一方面又煽动在京的英美等八国公使，在天津附近集结各国军队，准备实行武力进攻，并且发出最后通牒——哀的美敦书，限24小时内答复。3月18日北京各界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到天安门举行了大会，反对八国通牒。

当时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之一，李大钊同志组织了这次大会，各大中学校党的地下组织，积极参与，北京学联通知各大中学参加反抗运动。清华大学同学步行进城参加了这次反帝爱国大示威。北大、朝阳、辅仁等大学都整队前去集会。刘和珍当时是北京国立女师大学生自治会主席，英文系学生，她率领女师大学生参加大会。私立燕京大学男校学生自治会主席、共产党员刘肇安同学18日一早召开学生自治会，决议罢课参加运动。我那时是燕大女校理学院数学系学生。当时恰好来铠甲厂男校上课，闻讯马上赶回灯市口女校。路遇我校学生自治会主席黄巧云同学，就一同返校开会。会上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是胡适派代表，那是少数派，说什么学生参加政治运动没有好结果，反耽误了学业，得不偿失，不必参加；另一种是我们多数人，坚决要求参加这一伟大的爱国行动。我们在会上慷慨陈词：“帝国主义如此猖狂，政府又如此腐败无能，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人民怎能袖手旁观，不论结果如何，我们应当表示民族气节，起来反抗，极力争取才对”。最后绝大多数的同学激于爱国义愤，通过决议，与男校同学一同参加，由我率领女校第一分队走在最前面，执校旗的是我们数学系的高个子魏士毅同学。

学生队伍先在天安门广场集合开会，会上爱国人士徐谦先生讲了话。会后示威游行，同学们精神饱满，情绪激昂，边走边呼口号：“打倒帝国主义”，“反对八国通牒”等。当游行

队伍走到铁狮子胡同段祺瑞执政府前，我们递交了请愿书，要求拒绝八国通牒，驱逐八国公使出京。北洋军阀政府不但不支持学生们的反帝爱国行动，反而在帝国主义的威迫下，竟然下令武装军警，持刀枪棍棒，向手无寸铁的爱国学生开枪射击，挥刀砍击，棍棒殴打，竟达半个多小时之久。同学们虽奋力反抗，终因赤手空拳，而被这些豺狼成性的刽子手，屠杀得血染大地，当场惨死的有47人，受伤的有二百余人。当时刘和珍烈士就是在段祺瑞执政府东辕门中弹的，弹从右肋射入，斜穿心肺，自左腋穿出，血如泉涌。但她仍挣扎着向前爬行，一个北洋军阀士兵追上去，用木棍乱击她的头部，她于是壮烈殉难、为国捐躯。她牺牲时才二十二岁。鲁迅先生为此写下了《纪念刘和珍君》的名篇，称她是“为国而死的中国的青年”。北京女师大的杨德群、燕大女生魏士毅等均身中数弹，壮烈牺牲。有的同学被刺刀穿胸而过，有的被砍断手足，我校女生魏拯之同学被迫追至居民家，大腿中弹倒下，幸被男校学生自治会干部于成泽同学发现，背出重围，送往医院救治，才免于死。我们这些幸存者都被迫赶得盲目四处奔逃。记得江兆菊（曾任宋庆龄副主席秘书）与张顺英（复旦大学副校长谢希德的母亲）跑错了方向，至晚才返女校。

当示威群众被反动军警驱散后，我与于成泽同学，还有一位美籍教师向段祺瑞执政府交涉认尸寻伤时，只见附近街边两旁，刀枪林立，戒备森严，如临大敌。政府前大院中尸横遍地，死者伤者血流纵横，惨不忍睹。当我们翻起第一具尸体就是我校数学系的魏士毅同学——多熟悉的面孔，多好的同志，热爱祖国，献出了生命。她的形象至今仍萦回在我的脑海。本来我们三人（还有梁启超的女儿梁士怡）同桌吃饭，梁士怡听到枪响，跑出去拉魏士毅回来暂避。而魏仍向前冲去，旋即中弹牺牲。我们到医院寻找受伤者时，只见病房多已人满，有的伤员仍卧在院子地上，以石为枕，忍痛呻吟，怎不痛心！

我们回到女校门口迎接陆续归来的同学，只见他们义愤填

膺，决心要与帝国主义及中国反动派血战到底，个别同学因受刺激太深，神经失常，曾赴西山短期修养。

血的事实，使我们进一步认清了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狰狞面目，也教育了我们，使我们懂得只有在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下，团结广大人民群众，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压在人民头上的大山，人民才有生路，中国才有希望！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心潮起伏不已。今天中国各族人民在党中央领导下，满怀信心地向四化进军，我们这些亲身参与“三·一八”运动的幸存者，应该继承死难烈士的遗志，在新长征途中，再接再厉，谨以此来告慰先烈于九泉。

北伐军进攻南昌见闻

蔡 冀 华

一九二六年春，当北伐军第六军程潜部队一个团开到离南昌不远的消息传来时，江西督军邓如琢惊恐万状，不敢应战，把督帅印交给岳思寅代为管理，自己忙着逃命，退到樟树。元帅在逃，军心涣散，毫无斗志，于是北伐军先头部队以一个团兵力于九月十九日晚第一次进入了南昌城。他们进城后，睡在街上屋檐下，军容整齐，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第二天一早，老百姓欢天喜地的庆祝胜利。不幸，数天后邓如琢的心腹刘棠写信到樟树密报邓如琢说：进城的北伐军只有程潜第六军一个团的先头部队，其他后援部队还未能及时赶到，要邓如琢即日把部队调回南昌进行反扑。九月二十三日晚，北伐军认识到，以一个团的孤军深入腹地，有被包围的危险，便准备于次日一早自动退出城外。但邓如琢的部队已调回南昌，于当夜偷进了城。他们进城后即下令紧闭城门，各个城门都派重兵把守，不许任何人出入，竟允许城内士兵劫杀三日，并纵容他们可以自由行动，顿时满城风雨，秩序大乱，抢杀事件不断发生，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呼号无门，欲逃无路。整个南昌城顿时变成人间地狱，惨不忍睹。

当邓如琢的部队偷进城时，北伐军作了紧急撤退，但还留下十多个营连级干部在城里（有的是我表哥蔡仲威在云南讲武堂学习时的同班同学，他们是远征军，行军时为了避风雨，一律带上军用草笠，因长途跋涉，日晒雨打致使额上和脸上呈现着黑白分明的标志，额上有草笠遮掩，晒不到太阳保持着原来肤色，面部曝露在日光下变成黑色——很易辨认）。邓如琢为

了想一网打尽留在城内的北伐军，便下令，凡是见到脸上有黑白分明标志者，一律格杀勿论。在此情况下，这些留下的同志就有牺牲的危险，为了挽救危局，我母亲蔡蕙急中生智，以救死扶伤为借口，举办红十字会。主意立定就和南昌妇院（现妇女保健院）院长康爱德协商（她是个热爱祖国，民族意识很强的女性，是蔡蕙的好友，就住在医院隔壁），要她大力支援开办红十字会，并请她说服南昌医院院长姜孙（他夫人也是蔡蕙的朋友），共同合作，以两院院址和原有的设备及医务人员为基础，开办战时红十字医院，临时所需经费及粮食由蔡蕙负责筹划，医药设备甚至医务人员薪金都由两院负责。因为了解到北伐军组织好，纪律严明，又是为挽救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而战，出于人道主义思想，于是很快达成了合办战时红十字医院协议，遗憾的是战场离院址太近，流弹不断在医院上空飞过，甚至有不少落在院内，有几次把医院门窗都打穿了。护士们从未经过战争，怕危险，谁也不敢回到医院工作。没有护士，工作就无法进行，那时我在南京东南大学肄业，七月初回家度假，适逢战争爆发，交通阻塞不能回校上课，于是我第一个报名参加救护工作。在我的大力宣传和影响下，他们又看到外国人尚且愿为救死扶伤出力，身为护士怎能袖手旁观，便纷纷报名参加，从此医护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当时南昌正处于紧急戒严的情况下，荷枪实弹的巡逻兵，日夜不停地挨家挨户搜查、抢劫，为了掩护这些脸上有明显标志的同志免于被捕，蔡蕙便把他们派到医院冒充服务员，做些杂事使他们得以蒙混过关，没有被邓如琢部队发现。当时南昌城内因士兵互相残杀，许多人又被流弹打伤，因此医院住满了伤号。在战争激烈时连尸体都不能出城掩埋，不得已就堆在医院地下室，因时间久了尸体腐烂，散发出难闻的恶臭，同时还惹来了成群结队的苍蝇到处乱飞，真令人难于忍受。工作忙环境恶劣，吃不下饭，晚上还要轮流值班，虽然大家精疲力尽，但为了一个共同目的，就是希望北伐军早日打垮敌军，进入南昌城以解民困，只要能达到

这个目的，即使再苦些也甘心情愿毫无怨言。战争日益激烈，子弹穿梭般不断落到医院内，我们仍然坚持在院内从第一部跑到第二部紧张地送药品，抬伤员。那无情的流弹总是呼呼地从头上飞过，但谁都没想到自己生命的危险，生死已置之度外。此种爱国爱民之心是多么感人啊！

当时北伐军是秉承孙中山先生遗志：“联共联俄”政策组成的军队，纪律严，战斗力强，军中有政治部负责政治宣传工作，深得民心。军队用的武器大部份是苏联供应的，还有苏联顾问参加出谋献策，攻打南昌时苏联顾问也随军参战。战斗日益激烈，且常有飞机前来侦察。记得南昌上空第一次出现飞机时大家都昂首向天空仰望，拍手欢呼，因为从未见过飞机，谁也没有意识到危险。北伐军开展围城战愈迫愈近，邓如琢即下令守城兵士不惜任何牺牲固守，并把城外房屋全部焚烧，四面八方火光冲天，顷刻间枪炮声，喊杀声，房屋倒塌声，老百姓呼天嚎地哭泣求援声，震耳欲聋。大火数日不灭，北伐军赶到城下，把各城门团团围住，由于守军负隅顽抗，一时不能攻下城池，于是，在大炮飞机掩护下组织敢死队，用长梯顽强爬城，守城军一面用机枪猛烈扫射，一面又用刺刀刺，用石头砸，不断的推倒长梯。（因我家和医院都离城近又是楼房比城墙高，所以能清楚得见到战场全景）。爬城战士虽然牺牲惨重，仍是前仆后继地不断往上爬。为了避免牺牲，北伐军由白天攻城改为晚上攻城，并改长梯爬城为搭人梯爬城，而且越战越勇，增援部队又不断赶到。守城的北洋军已疲惫不堪，加以粮尽援绝，防线终于被突破。在旧历八月十三中秋节前，北伐军开进了南昌城。进城后为了不打扰老百姓，他们就沿街扎营，在大街上店门前及老百姓屋檐下休息，第二天一早老百姓见了都欢呼雀跃，箪食壶浆夹道欢迎。十四号他们就贴出安民布告，中秋节晚蔡蕙为庆祝北伐胜利，在家设宴祝贺，共设三桌，有好几十个军官，在蔡仲威表哥的陪同下，前来赴宴，有的叫蔡蕙为大姐，有的叫姑妈，其中有陈奇涵、张培德、严盾

磨，还有许多人。他们的名字我一时忘了，他们都是表哥蔡仲威在云南讲武堂时的同班同学，大家相见，那种热情友爱的气氛真令人陶醉。他们休整后只四天又攻打九江，孙传芳部队已丧失斗志，九江战役只进行了一星期就结束了。

南昌战争一结束，我们救护工作就繁忙起来。清理战场，抢救伤号，掩埋尸体，还雇用了许多民工担任掩埋工作。我们用担架先把重伤员抬到医院抢救，轻伤能走动就只好用拐棍自己行走。埋尸体担架不够用，就将他们备用的军毡裹着尸体用绳绑紧两头穿上竹竿抬走。护理伤员比护理一般病人工作繁重可怕，他们因流血过多不停叫喊口干，要不断供给饮水。伤员要天天清洗换药，又脏又累，更可怕的是他们发高烧时往往发狂，突然坐起来把靠近他身边的护士紧紧抱住，他们心里要惦念着什么人，就把你当他们惦记的对象，哭诉狂叫，常使一些胆小没经验的护士吓得狂呼求援。我胆子比较大，大家一定要我陪他们上夜班，有时对重伤员，为了保护他们的生命不得不切肢时，事先要先做他们的思想工作，事关重大，这个工作很难做。有一次轮着我到手术室协助工作，为一个右臂受了重伤的战士切肢，他一进手术室就号淘大哭，不断哀求医生发发慈悲，不要切肢，当抬上手术台时，他挣扎惨呼使人见了心碎，切肢时那种锯骨时发出的咕咕声令人不寒而栗。这是我第一次经历战争。

大革命时期我在南昌

参加革命活动的片断回顾

徐 先 兆

大革命时期，从广东北伐军于1926年11月初进入九江、南昌，到1927年“八一起义”时止，这九个月我几乎都是在南昌度过的。现在就我所能记忆的一些往事，作为片断史料，以供参考。

我原在南昌省立二中读书，毕业后到南京东南大学（后为中央大学，现南京大学）读书，由于搞革命工作，北洋军阀孙传芳要逮捕我，乃逃到上海。十一月初，广东北伐军克复了九江、南昌，中共中央派十个人回江西，我是其中之一。船到九江时是在深夜，我们上岸，我心境非常高兴。因为我痛恨北洋军阀，自从民国二年（1913年），江西都督李烈钧举行二次革命失败以后，江西人民便被践踏在北洋军阀统治者的脚下，经过斗争今天看到了国共合作的北伐军，我怎能不高兴？

一到九江我便被留下了。方志敏同志原在庐山养病，因为孙传芳的军队正驻扎在九江、南昌一带同北伐军作战，使他不能下山。北伐军首先打下九江后，志敏便下山到九江主持工作，创办了九江《国民新闻》。但是他是想回南昌的，因为他是当时国民党江西省党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从党中央来电通知中，知道我要回江西，便留下指示，要我主持九江《国民新闻》，他便去南昌了。我接受了留九江工作的任务。当时国民党九江市党部是由曾延生同志（烈士，曾山同志的叔父）主持，他是当地我党的领导人。另外还有冯任同志（烈士，都昌人）等，都在九江工作。

我们在九江召开了群众大会，庆祝北伐军胜利，欢迎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和俄国军事顾问加伦将军。大会由曾延生主持，我担任记录。邓演达和加伦都在大会上讲话，他们的讲话内容现在记不清了。不过当时《国民新闻》是有报道的。

《国民新闻》还有副刊，由我主编。曾转载袁孟冰同志主编的上海共青团编辑出版的刊物上的一些文章。

我在九江大概只呆了十天左右，便接到南昌来电，要我即去南昌。九江同志留我，但我坚决要走。第二天早上到火车站，搭军车赶赴南昌。

当时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把原来为北洋军阀作喉舌的《新民报》没收了，改为《江西民国日报》，作为北伐军总司令部的机关报。由总政治部代理主任季方同志负责人事安排。决定派洪宏义（罗漫）任报馆经理，陆更夫同志任副刊编辑，总编辑由我担任。

报馆馆址在毛家园，是一栋二层楼的房子。报馆的创办人员是姜凡，据说原是倾向同盟会的老国民党党员，创办了江西《民报》。大概是由于李烈钧发动的二次革命失败，北洋军阀统治了江西，报馆态度改变，便改名为《新民报》吧。我是民国七年（1918年）来南昌读书的，当时《新民报》由姜凡的儿子主持。这个人在政治上倒向北洋军阀，《新民报》成了北京派来的所谓督军的喉舌，接受了大量的津贴。对于一般商人，如果有什么把柄被他抓到，便乘机敲诈，满足了他的要求便罢，否则非弄到倾家荡产不可。因此他弄到了不少钱，购置了新的印刷器材，报纸消息比较多，也比较快，成为南昌第一家大报。

我们当时在孟冰的领导下，组织了改造社，编辑出版了《新江西》杂志。孟冰最痛恨《新民报》，写了文章批评它。一般思想进步的青年也都对它不满意。因此《新民报》便成了北洋军阀在江西的反动政府的殉葬品，北伐军一进南昌，便没收了它，改为《江西民国日报》。

过去江西报纸的版面编排，形式陈旧，只有一栏一栏的短栏登载消息，没有破栏长行的标题和版面。我对报纸的版面进行改革。可是我在稿子上标明要破栏长行，而印刷工人不习惯，图省事，还是短栏短题。因此我编完稿子后，还要亲自到排字房督促工人照我的办法排印。常常弄到凌晨才能上床休息。

当时经常举行群众大会，我为了扩大宣传，以大会内容为报纸的头条消息，而且采用破栏的长题，还用新写的木刻字刊印出来，以引起读者的重视。总司令部每星期一都举行总理纪念周，我便在报上作特别报道。社论是专由我自己写，几乎每天一篇。可惜那些报纸没有及时保存下来，抗战时期国民党从南昌撤退，把一些旧报都烧掉了。

我当年才二十多岁，自觉办报缺乏经验，向组织请求辞职。党的负责人刘九峰同志要我向李富春同志请示。李老当时是国民党第二军的党代表。他对我指示，要虚心学习，努力把报办好。向有经验的同志请教，不必辞职。后来孟冰同志由党中央派回江西，有一次，对我个别谈心，进行教育，并指出：办报首先要有准备杀头的决心。这句话，启发我认清党交给我负责办报任务的重要性。

北伐节节胜利，武汉代替广州，成了革命“首都”。可是总司令部却设在南昌，因此南昌的地位也很重要。我到南昌不久，有一天听说邓演达要从广州来南昌，大家便到章江门外沿江那一带去迎接。当时人山人海，应该来的人都来了。我注意到蒋介石披一件黑色的大风衣，几乎从肩披到脚，还有加伦将军，也披着一件大风衣。全场军官中就只他二人披着大风衣。大概只有将军才能这样吧。后来邓演达来了，他是坐水上飞机从广州飞来的。飞机降落在赣江水面上，有小划子接他上岸。南昌当时没有飞机场，只有水上飞机才能降落。这在当时的南昌是不容易见得到的场面啊！

当时俄国军事顾问不只加伦一个人。加伦是总司令部的顾

顾问，各军军部，如第二军、第三军、第六军都有俄国军事顾问。有一天夜里，不知是开会还是别的什么事，我和一些同志到了一位俄国顾问的家里，他好象是工人出身，会说中国话。他用手比比，口里说：要杀掉。大概是正谈到北伐军的军官里有一些坏蛋吧。他们住在现在省第一人民医院住院部门口那条街上，因为当时只有那里有一两栋洋式房子，有美国医院（现省一院）和美国教会办的学校葆灵女校（现十中）、豫章中学（现七中），有些洋式房子，因此那些俄国顾问愿意住在那里。

广东国民政府从广州迁往武汉，有一部分国民党中央要员绕道南昌（另一部分则由长沙直接前往）。我记得其中有谭延闿、徐谦、宋庆龄、何香凝等。我在那年三月十二日参加南京中山陵奠基典礼时见过宋庆龄。这次她在群众欢迎大会上发表了讲话。当提到孙中山先生时她语调深沉，使人感动。谭延闿讲话却不在皇殿侧公共体育场（八一公园），而是在百花洲苏公祠前面，没有搭讲台，他便站在板凳上讲。他说：大家不要因为国民党政府还没有象北京军阀政府那样设在古老庄严的宫殿里，便没有信心，其实现在的北京政府象一栋破房子，甚至象一个臭厕所，没有一点存在的价值了。他这些话我认为是说得很深刻、很生动。

当时陆更夫同志任《江西民国日报》副刊编辑，编得很好。副刊过去不被重视，叫做报屁股，写的都是茶余酒后供人谈笑的文章。有的报纸就没有副刊。《新民报》有副刊，登载一些旧式文人的诗词之类的稿子。不过在1922年下半年到1923年上半年，孙师毅、刘和珍等同志编的《时代之花》周刊，附在该报发行，却是很有价值的刊物。更夫编的副刊，取名《呐喊》，政治性强。他很认真，记得有一天晚上，排字工人来说，副刊稿子不够。我便随手把我给女友写的一点诗、信交去作为补白。第二天更夫见了，大发脾气。更夫只编了个把月，便到武汉去了，我们还通信。我曾把那些信登出来，题为“两

湖之间”，因为他住在武昌东湖军校，而我则住在东湖边的报馆里。更夫走后，副刊由朱企霞同志主编，他还保存了当时的《呐喊》副刊。

1927年1月，江西国民党召开全省代表大会。由于北伐军进了南昌城，一些投机分子和反共分子纷纷钻进了国民党，增强了国民党右派的力量。不过人数还是不多。选举结果，方志敏同志等国民党左派得票很多，应该继续当选为省党部委员，而那些右派，如程天放等人却得票不多，于是段锡朋以国民党中央特派员的身分在会场上大闹，说选举有问题，结果便决定把选举情况报告国民党中央党部。蒋介石等人竟用所谓圈选的办法，把得票少的定为委员，而得票多的反而落选，这真是选举史上的奇闻。这样，国民党江西省党部便落入右派之手。不久，我便被免职，搬出了江西民国日报馆，到共青团江西省委机关（在羊子巷洪恩桥）去住，以后便编辑《红灯》周刊。国民党省党部还给了我一个宣传委员的名义，但是我没有理它。

1986年5月14日于江西师大